

一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1. 南北形势与宁汉分裂

从 1926 年 7 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胜利。由广东出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先后占领了湘、鄂、赣、闽、皖、浙、苏等地区，控制了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其势力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然而，就在这时，南方革命阵营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变动。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实行“清党”，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4 月 15 日，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基本失败。4 月 18 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

这样，1927 年春夏之际，在南北对立的的同时，长江流域又出现了宁汉对峙的局面。北

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同时并立，形势错综复杂。

在北洋军阀方面，盘踞中原的吴佩孚集团已基本被消灭，其余部龟缩于河南洛阳、巩县一带，苟延残喘。孙传芳的五省联军遭受重创，退守江北，实力大为削弱。只有张作霖的奉军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尚属完整。张作霖成为残存的北洋集团的中心人物。

在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人的拥戴下，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继续与南方的国民党政府相对抗，同时作出妥协的姿态，通电“讨赤”和“息争”，宣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即属救亡之同志”。他又诡称“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宗旨本属相同”，企图以“讨赤”的旗号，分化南方阵营，联合南京政府和阎锡山，共同反对冯玉祥和当时尚未反共的武汉政府。

南京政府以蒋介石、胡汉民和桂系集团为主角，辖区有江苏、浙江、安徽一部、福建、上海、南京市。广东、广西也属南京节制。因地处东南富庶地区，得到江浙财团的支持，南京政府的财政来源比较充足，岁入可达2亿元之多。其主要的武装力量，是蒋系和桂

系的军队。

南京政府成立后，一面积极准备“西讨”武汉，一面与张作霖暗通款曲，谋求妥协。一时“蒋奉阎三角联盟”之说甚嚣尘上。但因张作霖坚持“统二不统一”，不肯让出北京的宝座，双方的谈判没有结果。而张宗昌、孙传芳陈兵江北，构成严重威胁，南京政府不得不继续进行北伐。

1927年5月1日，蒋介石决定第一集团军分三路北伐：第一路以何应钦任总指挥，由镇江、常熟渡江北上，肃清江北；第二路蒋介石自任总指挥，由白崇禧代理，从浦口渡江北上，由津浦路正面作战；第三路以李宗仁任总指挥，由芜湖渡江，北上解六安、合肥之围，联合进攻陇海路。

武汉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在地，但它实际控制的只有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唐生智、张发奎部是其军队的主力。南京宣布反共后，掌握武汉政府大权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对国共合作更加动摇，反共倾向日趋明显。从军事上看，武汉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摆脱孤立，寻找出路，武汉政府也把希望放在继续北伐上。4月19日，武汉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典礼，决定

由唐生智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分兵三路沿京汉线北上，进攻河南奉军。

冯玉祥的国民军是宁汉之间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宁汉双方都欲拉冯自重，削弱对方。但冯玉祥却认为当前的大敌是奉、直军阀，宁汉双方应消除分歧，共同致力北伐，完成统一，因而表示“对于任何个人方面，不敢稍存厚薄之成见”，并电劝双方“相忍互让”。

1927年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就任武汉政府所委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向河南出动，沿陇海路东进。5月26日，攻克洛阳；31日，进抵郑州；次日占领开封。

与此同时，武汉第四方面军也挥师北上，5月28日，攻占临颖，大败奉军；29日，占领许昌。6月1日，第二集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郑州会师。入豫奉军因战事不利，被迫退守黄河北岸。

在津浦线方面，第一集团军亦于6月2日攻占徐州，与第二集团军会师，直鲁军退向山东境内。

陇海路会师后，宁汉双方争取冯玉祥的活动进入了更加紧张的阶段。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重要会议。为争取冯玉祥的支持，武汉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双方决

定：第四方面军按“原定计划”班师回汉；河南、西北军政大权交冯独揽，由冯任开封政治分会主席，负责指导陕、甘、豫等省政务。冯则拒绝了共同“讨蒋”的要求，而提出愿调解宁汉之争，武汉方面的希望完全落空了。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武汉政府便将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由唐生智任总司令，以与蒋、冯、阎平起平坐。

南京方面也不甘落后，郑州会议十天之后，6月20日，蒋介石就和冯玉祥在徐州举行会议。此为蒋冯第一次会面，蒋介石盛情款待，吹捧冯为“北方军事领袖”，许诺每月接济西北军军饷200万元，极尽笼络之能事。会谈中冯坚持北伐为当前急务，不同意进兵武汉。双方遂决定共同北伐，第一集团军负责津浦线，第二集团军负责京汉线。关于武汉问题，冯表示愿意劝说武汉政府立即“清党”，并迁往南京实行合并，冯玉祥的态度表面上“不偏不依”，但实际上有利于宁方而不利干汉方。在争取冯玉祥的问题上，南京占了上风。

山西的阎锡山集团是各方争取的另一支重要力量。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阎锡山一直态度暧昧。直到1927年4月，南胜北败的局势明朗化，他才迟迟做出表示，下令取消北京任命

的“督办”名义，自称“晋绥总司令”，并令军队信服三民主义。4月25日，武汉政府为争取阎锡山支持北伐，特任其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但阎拒不接受，而把宝押在南京方面。6月，阎下令山西“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旗，军队改称国民革命军；并通过决议在山西实行“清党”和拥护南京政府。接着，阎在太原就任自封的“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做出了参加北伐的姿态。

6月上旬，南京政府决定进行北伐第四期作战，从徐州、皖北、苏北三路进攻山东。6月18日，鲁南战役开始，但作战进展并不顺利。7月上旬，第一集团军进攻临沂受挫，战事呈胶着状态。

为配合津浦线作战，冯玉祥也命第二集团军渡过黄河，向奉军发动进攻。冯同时按照徐州会议的决定，向武汉施加压力，要求汪清卫“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清共，并于7月7日率先在洛阳宣布“清党”。

在内外压力下，武汉政府决定抛弃孙中山亲手制定的三大政策，加快反共的步伐。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步蒋介石后尘，实行“分共”；同时，仍称蒋介石是“党国惟一的敌人”，南京政府是“伪中央”，号召“打到南京

去”，调集兵力，积极准备东征。蒋介石也从津浦线抽调主力，策划西讨武汉。宁汉之间，顿时剑拔弩张，战云密布。

正当武汉、南京准备大动干戈之际，中共于 8 月 1 日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汪精卫、唐生智于慌乱之中，急忙调集重兵镇压。

在津浦线战场，7 月 24 日，直鲁联军趁第一集团军主力南调对付武汉之机，立即发动反攻。徐州得而复失，北伐战事呈逆转之势。蒋介石只得暂停征讨武汉，亲自督师反攻徐州。但南京军队已无斗志，反攻失利，直鲁军趁势猛攻，宁军节节败退，于 8 月中旬全线反撤至长江南岸。孙传芳军旋跟踪至江北沿岸，形成隔江对峙，第一次渡江北伐完全失败。

在遭受严重挫败的情况下，宁汉双方不得不把分歧暂时搁置一边，以谋求妥协。

2. 宁汉合流与“中央特别委员会”

1927 年 7 月中旬，冯玉祥鉴于北方军事形势严重，建议召开开封会议，调解宁汉冲突，并派代表分头疏通。于是，“宁汉合作”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南京方面桂系集团积极

活动，扮演了重要角色。8月8日，由李宗仁出面致电汪精卫等，称赞其决心“分共”，并邀其来宁商谈。10日，汪精卫复电李宗仁，虽仍坚持“武汉之中央党部及政府，实为党国之最高机构”，但承认对共产党“防制过迟，致酿成南昌之变，深感内疚”。这是宁汉双方数月来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它打开了双方协商谈判的大门。

冯玉祥倡导宁汉合作于外，李宗仁等积极响应于内，武汉唐生智又通电讨蒋，使蒋介石处境十分被动。蒋抽调主力讨伐武汉，导致徐州之败，更成为桂系发难的理由。蒋将北伐失败归咎于武汉牵制，李宗仁却说：“早就不要顾及上游，因武汉方面，可以商量，可以合作。”蒋只得表示：“只要武汉可以合作，如果以我在成为合作之梗，那我可以辞职下野。”李、白等“武装同志都说蒋先生要歇歇”，何应钦则态度暧昧。

面对桂系的压力，蒋介石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8月13日宣布下野，返回奉化原籍。临行前为推卸津浦路战败责任，他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枪毙。14日，胡汉民等亦随之辞职，行前电冯玉祥谓“一柱擎天，惟公有焉”。蒋、胡等离去后，宁汉合作遂加速进行。

8月14日，白崇禧等电汪精卫，称蒋已辞职离宁赴沪，现双方所争持者皆不成问题，请派代表赴浔面商。19日，武汉政府宣布迁都南京。22日，李宗仁与汪精卫在庐山举行会谈，就宁汉合作达成初步协议。9月5日，汪精卫等汉方要员抵达南京。接着，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为了统一党务和组建新的中央政府，在上海开始了讨价还价的谈判。汪精卫以国民党“正统”自居，遭到各方的严重抵制，宁派力主非汪下台无以平党员之愤。汪一气之下，于9月13日宣布“引退”，秘密离沪赴赣。15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在南京举行，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其任务及职权为：行使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之职权，到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为止；统一各地党部；筹备国民党三全大会。次日，中央特委会在南京宣告成立，稍后，组成了新的国民政府，名义上取代了宁汉分裂的局面。

中央特委会是国民党的临时领导机构，它虽说以宁、汉、沪三方合作为基础，但实际上获利最大的是桂系集团和西山会议派。主持特委会日常工作的是所谓的“执政三常委”，即李烈钧、蔡元培和谭延闿。由于蒋、汪、胡三

巨头均不在位，特委会缺少真正的中心人物，内部派系复杂，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它的致命弱点；而且特委会的成立，以中央执监委员会会议代替中央全会，违背了国民党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也为反对派留下了口实。由此可见，特委会的地位是虚弱的，它的寿命必然是短暂的。

正当宁汉分合、扰攘不定之际，南北军事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8月26日，孙传芳军强渡长江，占领龙潭，切断宁沪交通，情势危急。何应钦第一军会同李宗仁第七军由南京和镇江两头夹击孙军，激战五日，全歼敌军，取得龙潭大捷，使成立不久的南京政府得到巩固。

龙潭之战提醒南京注意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同时武汉方面也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汪精卫等在宁汉合流中一无所获，自不甘心。9月21日，汪清卫、唐生智返鄂，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并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特委会。唐生智自任湘、鄂、皖三省联军总司令，决定依靠湘、鄂、赣三省地盘，与南京政府相对抗；并派兵布防长江下游，威胁南京。宁汉合流的局面又为宁汉对立所代替。

原武汉政府的另一支重要武装——张发奎

部，则在黄琪翔率领下，于 9 月中旬返回广东，企图另创局面，重谋发展。为了对付上述威胁，南京决定双管齐下，同时进行北伐和西征。

南京政府 9 月 6 日再度下令渡江北伐，第一集团军分别从采石、浦口、江阴渡江北上。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面对奉、直的军事压力，也开始采取联合行动。9 月 29 日，阎锡山誓师讨奉，分两路进攻奉军：阎亲率右路军沿平汉路前进；商震率左路军沿京绥路进攻，晋奉战事爆发。10 月 9 日，冯军也从陇海路对直鲁联军发起攻击，并在兰封战役中重创敌军。为统一指挥北伐军事，南京政府任命何应钦为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沿津浦路进攻孙传芳军。第一路军于 11 月 8 日发起攻击，16 日攻克蚌埠；并与第二集团军会合，于 12 月 16 日再克徐州，将陇海路东段之敌肃清。

桂系集团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急于打通南京与广西老巢的联系，故对割据两湖的唐生智视做眼中钉，极力拉拢程潜和谭延闿，主张讨伐唐生智。在桂系的策动下，南京政府对武汉发动了政治、军事两方面的攻势。10 月上旬，南京政府派孙科等到武汉与汪精卫、唐生智谈判，要求取消武汉政治分会和改组安徽党政机

构；同时，调兵遣将，紧锣密鼓地准备西征。唐生智不肯放弃安徽的地盘，宁汉谈判破裂，南京遂以此为借口发动武力讨唐。10月20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以李宗仁、程潜为第三、第四路军总指挥，分别率江左军和江右军由江北、江南两路西上，进攻唐军。

西征讨唐得到了两广和冯玉祥的响应。冯军从河南沿平汉线南下，威逼武汉；驻在鄂西的鲁涤平第二军也宣布反唐。唐生智四面受敌，只得退守武汉。西征军进展迅速，10月27日攻占安庆，并分三路入鄂，很快逼近武汉。唐生智见大势已去，被迫于11月11日通电下野，转道赴日本；军队则由刘兴、李品仙、何键率领，退向湖南境内。11月14日，西征军占领武汉。南京政府决定撤销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桂系胡宗铎任武汉卫戍司令。西征军随即攻入湖南，占领长沙，唐生智余部相继接受改编，西征讨唐遂告结束。

西征讨唐是国民党新军阀间的第一场内战。在这场内战中，原来盘踞两湖的唐生智遭到严重挫败，而桂系集团则掌握了两湖地区的军政实权，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原来在宁汉之间保持半独立地位的广东，

现在成了与南京对立的另一个中心，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出于加强自己实力和围剿南昌起义军的目的，接纳了由江西返粤的张发奎第四军；并采取联汪立场。10月7日，李济深与张发奎联名电请汪精卫回粤，“主持党国大计”，同时派代表赴汉迎汪南下。汪精卫知唐生智不可恃，遂于宁汉战争爆发前一日转道赴广州，其他汪派人物也纷纷南下。10月29日汪抵粤后，即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恢复中央执、监委员会，取消特委会。这样，宁汉对立刚结束，宁粤对立的局面又出现了，国民党内部依然四分五裂，纷争不已。

3. 蒋介石东山再起

蒋介石虽然宣告下野，住在奉化溪口的雪窦寺，但他在南京政府党政军中的原班人马基本未动，势力仍存，仍然是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继续在政治、军事和财政上左右着时局的发展。蒋本人也并未悠游山林，而是“人在山中，心存魏阙”，时刻准备东山再起。蒋介石明白欲统治中国，获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是一个关键。因此，他并不急于立刻上台，而是趁南北、宁汉大动干戈之际，于9月

28 日乘船东渡，在张群等人陪同下，开始了日本之行。

蒋介石抵达日本后，即发表宣言，大肆宣扬中日合作之必要。他首先拜会了黑龙会头子、著名的中国通头山满，意图通过他与日本各界及各国使节进行广泛接触。

日本政府对这位中国未来统治者的来访，亦予以高度重视。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先后与蒋进行密谈。会谈中，双方签订了四条密约：蒋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蒋坚决反共到底；日本支持蒋政权；日本借给蒋 4000 万日元，蒋安定中国后，中日将进行经济合作。

蒋以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利益为条件，换取了日本政府的有限支持。事实很快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根本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而是企图通过扶植和操纵不同力量，为其扩大侵略创造条件。

除了日本之外，蒋介石还特别寄希望于美国。他在日本帝国饭店举行的茶话会上特意宣布，准备接受任何强国的支持。美国立刻理解了蒋的话外之音，加紧了与蒋的接触。美国政府指令美驻日特使直接与蒋谈判，并签订了美蒋密约。其主要内容为：美全力支持蒋建立政

府，统一中国；蒋氏政府将尽力保障并发展美在华利益；中国政府应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和其他在华权益。这份密约是蒋介石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的开始，也反映了美、日在华达成的妥协。

蒋介石此次日本之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拜谒宋美龄的母亲倪氏，请其同意他与宋美龄的婚事。蒋到日本后，很快拜见了正在神户养病的宋母，获得了其对婚事的允诺。回国后，蒋按照商定的条件，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

蒋宋婚姻是一种政治结合，它对现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宋氏家族在国内外有很高的地位和广泛的联系，通过与宋美龄结合，蒋不仅与孔宋财团挂上了钩，而且获得了与西方世界尤其是与美国联系的重要渠道，同时又与孙中山攀上了亲戚，一举数得，身价倍增。

南京特委会是蒋介石重新上台的障碍。下野期间，蒋处心积虑地要踢开这块绊脚石。他采取的策略是联合汪精卫打击特委会。11月10日，蒋介石结束了对日访问，回到上海，立即着手与汪合作，以取代特委会。他电促汪赴沪晤商党务，主张从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

恢复中央党部，并在宁沪间煽动反对特委会，与广东的汪派遥相呼应。在各方的压力下，南京特委会只得接受李济深的调停办法，决定在四中全会召开前暂停职权；并将主持党务的西山会议派许崇智、张继、居正等派往日本；还同意先在上海召开有宁粤双方参加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

与此同时，在广东，张发奎与李济深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11月17日，张发奎部趁李济深与汪精卫同赴上海出席四中全会预备会之机，在广州发动军事政变，将李济深及桂系势力逐出广州，由张发奎任广州军委会主席，顾孟余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汪派掌管了广东的大权。李济深、桂系和南京都指责汪派勾结张发奎发动政变，反汪的呼声高涨起来。12月2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发奎，李济深部与桂系军队联合进攻广州。

正当粤、桂忙于内哄之际，中共趁广州敌人力量空虚，发动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宣布建立苏维埃政府，张发奎急忙调集兵力残酷镇压起义军。

汪精卫、张发奎因两次粤变而陷入窘境，反汪派借此大肆攻击，指责其为共产党。12月16日，南京政府下令查办与广州事变有关

之汪系人物。汪精卫在国内无法立足，于是日通电引退，悄然赴法；张发奎也被迫于 18 日宣布下野。广州复为李济深和桂系所控制。

广州事变导致了汪精卫派的失势，但南京特委会并没有因此而得利，它自己的生命也屈指可数了。反对派于 11 月 22 日在南京组织反特委会的示威游行，军警开枪镇压，打死三人，伤十人，制造了“一一二二”惨案。反对派遂以此为借口，大做文章，提出取消特委会、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把反特委会的活动推向了高潮。特委会穷于应付，焦头烂额，只得于 12 月 28 日宣布正式解散，从而扫除了蒋介石通向南京宝座的最后一个障碍。

汪精卫走了，特委会倒了，胡汉民随后也一走了之。惟一获利的只有蒋介石，他现在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等待着去填补南京的权力真空。一时劝进、效忠之声四起，大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貌。蒋的嫡系黄埔军校学生，四处活动，为之摇旗呐喊。冯玉祥和阎锡山处于奉张、直鲁的两面夹攻之下，苦战不止，因而迫切希望蒋氏复出，以便协调各方，共同北伐，遂联名通电全国，请蒋复职。第一、二、三集团军的将领纷纷仿效，联名电请；连原来逼蒋下野的李宗仁、白崇禧现在也